

权力视域下女性主体建构与解构

——以《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为例

姚凤珠 陈变红

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

DOI:10.12238/pe.v3i2.12446

[摘要] 女性对自身主体地位的建构意味着平权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即追求与男性的平等地位,并作为主体对自身及外界保持独立认知,但在男性主导的社会秩序中,谋求平等与独立必然要直面操控与反抗的关系。作为林奕含用生命书写的自传体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不仅艺术化展现了人性的幽暗,更从深层意义上揭示了性暴力与权力支配的隐性关系。

[关键词]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权力意识; 女性主体; 建构; 解构

中图分类号: G322.21 **文献标识码:** A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Female Subje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Taking "Fang Siqu's First Love Paradise" as an example

Fengzhu Yao Bianhong Chen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women's self-dominant status means the awakening of equality consciousness and self-consciousness, that is, the pursuit of equal status with men, and as the subject of their own and the outside world to maintain independent cognition. However, in the male-dominated social order, the pursuit of equality and independence must directly confro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ipulation and resistance. As an autobiographical novel written by Lin Yihan with his life, Fang Siqu's First Love Paradise not only shows the darkness of human nature in an artistic way, but also reveals the implicit relationship between sexual violence and power domination in a deep sense.

[Key words] "Fang Siqu's First Love Paradise"; Power consciousness; Female subject; Construction; deconstruction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台湾青年女作家林奕含的处女作,也因她的自杀离世而成为封笔之作。该作品根据林奕含本人的亲身经历创作,描述了13岁少女房思琪惨遭自己补习班教师李国华性侵并遭受长达五年的精神控制,最终因不堪重负而自我毁灭的故事。作品可贵之处在于,它不是从施暴者和受害者的单一关系来呈现性暴力本身,而是以慢镜头展演了一场所有人一起助力完成的“向恶魔的献祭”^[1],通过剖析人性、叩问文化语境,展现性暴力对女性的重创和毁灭。

本文以文本细读的方式解读房思琪的反抗精神,并以女性主义理论为依托,研究权力意识形态下女性主体地位建构失败的诸多因素,挖掘作品对社会、文化的积极意义。

1 淹没在社会规训中的女性

传统文化语境中,女性是被男权制度规训的产物,“男性是

女性一面扭曲而不完整的镜子”^[2],折射出的是男性被夸大的映像和女性遭贬抑、被动服从的身影。女性无需主动开拓,便被早早“划定了僵化的未来”^[2],其身份的转变,不过是温顺地将自己从父亲手中交托到丈夫手中。因此,女性从小便被要求不能偏离规格,靠压抑本性在“传统和惯例中生活”^[2]。这种不被重视和认可的“他者”地位体现在评判标准上更为直观:“好女孩”应该是纯洁的、对性无知的,“好女人”婚后则应奉献家庭、远离公共空间。男性视角下,“女人的生物基本特性”是“障碍”^[2],提前介入“性”世界会妨碍被“捏塑”^[2],所以被要求婚前绝对禁欲。

规训之下,“性”空白便成了女性的性别特征。小说中年少的刘怡婷无意间提到涉及“性”的字眼,在固守传统观念的母亲眼里便如同犯罪,遭到她的严厉训斥和罚站,而在场所有人对此

都是默许甚至赞成的。房思琪的母亲得知女儿学校有学生在和老师恋爱时，嫌恶到恶语相向：“谁这么小年纪就这么骚”^{[1]82}？即使思琪和怡婷关系亲密如连体婴，像“坐拥灵魂的双胞胎”^{[1]85}，当房思琪告知自己被性侵的事实，也并不妨碍怡婷说出“你真的好恶心，我没办法跟你说话了”^{[1]19}、“要自杀别在我家跳楼”^{[1]20}这样的话。种种言行的本质都是将男性支配语言实践化的结果，以及替男性欲望的免责。

被性侵的少女们都是“从书上得知世界的惨痛、忏悔”^{[1]163}，没有机会窥探到人性的复杂与幽暗，这与她们所处的特殊的边缘空间有很大关系。作为学生，她们从小被要求以升学为结果导向，求学生活紧张混乱，“性”方面却不能长大，不可成型。因此，即便是被性侵，也会误以为自己只是邂逅了一场特别的爱情，出奇一致地对李国华妥协——“如果你是真的爱我，那就算了”^{[1]97}，也相信他金钱收买时的谎言“那不是钱，那只是我的爱具象化了”^{[1]146}。

屈从于男性权威意味着抹掉女性社会身份，女性只剩下负载着原罪和贞操的沉默的身体。李国华眼中，女性只有“红苹果皮的乳，杏仁乳头，笋的大腿，冰花的屁股，无花果的隐秘所在”^{[1]55-58}，他还多次将女性比作“桀羊”和“搪瓷娃娃”。房思琪也说自己“是喂掉的橙子汁和浓汤，是爬满虫卵的玫瑰和百合，是灯火流利的都市里明明存在却没有人看得到，也没有人需要的北极星”^{[1]86}。性别二元制秩序中，男人的“女性蔑视”^{[3]1}和女人的“自我厌恶”^{[3]1}观念由此固化。原罪意识一旦被激发，女性会自发地认为“自己的存在是污秽和病态的，甚至隐隐约有罪的”^{[2]568}，一旦说出真相，就要承受被排斥、驱逐、拒绝甚至抛弃的惨痛代价，因此，即便是被性侵，她们也只能面对要么沉默要么毁灭的单一选项。

驯顺成为女性的潜意识自觉。女性潜移默化的接受着男权制度的规训和改造，扮演好既定角色的同时，会不自觉地丧失主体意识和平权意识，放弃主导权和决定权，逐渐将男权歧视意识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成为男权制度的坚定拥护者和捍卫者。小说中的“师娘”就是完全遵守和顺应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沦为乐于“吞下女性身份药丸”的异化个体^{[4]51}。师娘大半生都浸润在男权意识中，只能消极被动地服从丈夫，遵照传统文化对她人生的设定，丧失了自主选择未来生活的能力。即使丈夫李国华当众承认性侵少女的事实，师娘的唯一要求也不过是瞒着女儿希希。她轻易原谅李国华，看似不可思议，实则是难逃夫权压迫和家庭束缚的必然结果。面对李国华“做爸爸的人，希望女儿在外面遇到什么样的人，自然会做什么样的人”^{[1]176}、“是她勾引的我”^{[1]176}、“就那么一次”^{[1]176}的种种狡辩，师娘甚至都不反驳。这看似是李国华的谎话起到精神麻痹的作用，实则是她被成功洗脑后的潜意识外化，是对李国华“只是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这一荒谬逻辑的默认。她忽略掉惨遭侵害的房思琪、郭晓奇同样也只是孩子，是别人家的女儿，只希望呈现给女儿美好完满的世界，却忘记了刻意筛选过滤后的认知本身就参杂假象，她的自私和短视本身就带有自我欺骗性。

“雕塑，是借由破坏来创造”^{[1]166}。女性从身体到思想上均被操控和规训，主体意识的丧失便是必然，于是便会不自觉地充当“工具人”，替男权发声。

2 女性主体地位的重构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很多研究者，对房思琪的解读定位为软弱的反叛者，更关注和突出她身上感性的脆弱，但笔者认为，房思琪并非单一的“受害者”和“毁灭者”的形象，而是“能向世界投射，超越的独立自主的主体”^{[2]489}。

“封闭性的阁楼和客厅，是一种女性化的家务劳动经济，正是这种经济帮助建立起了现代制度与习俗文化的形态”^{[3]33}。非剥削性社会中，男性专营暴力和破坏技术，女性从事日常生活和世代生产活动。这种劳动性别分工原则掩盖了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主体地位，以至于她“被监禁虐待了几年，即使出来过活，从此身份也不会是便利商店的常客，粉红色爱好者，女儿，妈妈，而永远是幸存者”^{[1]104}。文化惯性下，女性习惯于把头埋进沙子，在压抑中掩埋真实的内心，但房思琪却区别于小说中被“淹没”的女性群像，是最先清醒和自省的人。

房思琪是具有独立思考的反叛者。她认为，最接近“理想的人”^{[1]15}，应该是即使受时间侵蚀也永恒不变的，“因为某种因素而不被社会化的自然人”^{[1]15}，还提到，“只有非社会化才算是人类”^{[1]15}。可见房思琪从一开始就是坚守自我，拒绝被改造的，她的女性视域超越传统定义，不受男权语境的限制和束缚，强调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她试图建立女性主体地位，不止为寻求自我和解，更与社会问题勾联在一起。日本女性学者上野千鹤子认为，女性“不想被拘禁和灌药”^{[5]72}，就要不怕辜负周围人的期待，“坚持自己的问题意识”^{[5]71}。小说中，房思琪多次说文学辜负了她，并非是要文学背书，而是否决了文学作为美学存在的单一功能，要求它充当反映社会画的多棱镜。她多次质疑文化语境中的固有观念：“在这个你看我我看你的社会里，所谓的正确不过就是与他人相似而已”^{[1]103}，“古典这两个字要当成贬义的话，在我的定义里就是：视一切为理所当然”^{[1]160}。她还叩问文化语境对女性的精神拘禁：“这个社会就是用穿的衣服去评判一个人的”^{[1]110}，“一个人与整个社会长年流传的礼俗对立，太辛苦了”^{[1]117}，“为什么所谓的教养就是受苦的人该闭嘴”？^{[1]182}

房思琪对李国华的语言反击，反映出她女性平权意识的萌生。小说中，房思琪曾说自己对李国华有一种独属于语言的“最下等的迷恋”^{[1]105}，那么，从语言层面打破李国华的话语强暴就显得尤其重要。因此，她不仅多次拒绝李国华的求欢，还通过以其矛攻其盾的方式来解构李国华自成体系的语言系统，让他的语言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从而暴露他装模作样的虚伪嘴脸，嘲讽他“匮乏的乡愁，半吊子的田园诗”^{[1]183}。在房思琪看来，语言不应是禁锢自己的牢笼，而应该是戳穿谎言的利剑，她说：“忍耐不是美德，把忍耐当成美德是这个伪善的世界维持它扭曲的秩序的方式，生气才是美德”^{[1]221}，以及“忧郁是镜子，愤怒是窗”^{[1]84}这样的表述。同样遭遇性侵的日本作家伊藤诗织表示，假装

一切都没有发生的沉默并不能换来安稳和幸福,忍受痛苦没有意义,唯一让灵魂复苏,让自己痊愈的“还魂”方法就是追求真相,揭示真相^{[6]192-219}。语言对房思琪而言不再是无意义的宣泄痛苦,而是为了与李国华在平等的位置上表达愤怒,这与日本女性学者上野千鹤子观点一致:比起管理愤怒,女性应该首先学会如何表露愤怒。女性被允许拥有的羡慕、嫉妒等情绪,是弱者对绝对无法对抗的强者所抱有的感情,而愤怒才是当自己的权利受到位置对等之人的侵犯时该有的正当情绪^{[5]67}。

房思琪打破了“被遭遇”的女性形象。性暴力是一种犯罪,一种只要受害者保持沉默就会被当作没有发生过的犯罪行为。男权意识形态下,性暴力中的女性受害者被定格为“端庄的荡妇”^{[7]63},以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为例,整个故事由中年男人亨伯特讲述,受害者洛丽塔是失语的、被陈述的。而《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话语权则由房思琪掌握,受害少女不再是被动的受害者和被陈述者,而是易位为陈述者。让房思琪开口说话本身就代表力量,哪怕肉体和精神被双重摧残,她看见的“是不能和解的,是毁灭的,是宁愿无知也不想要看过的世界背面”^{[1]183},也不愿再屈从于非正当的教条、权威与霸权。

房思琪是作者林奕含的发声筒。《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以非虚构写作的方式承载了林奕含的全部观念和情感,作者与主人公房思琪之间是合体与分化的关系,房思琪作为林奕含赋权的重影或替身,是林奕含的情感共同体。所以,房思琪日记说的“书写,就是找回主导权”^{[1]167},自然也是林奕含的写作初衷,她还借房思琪表达了更为明确的态度:“写,不是为了救赎,不是升华,不是净化……而是世界上没有人应该被这样对待”^{[1]221}。女性表达无法避免地面临传统父权制文化的凝视甚至围猎,女性的叙述言说本身就是布满危险的实践,所以梁鸿才说“写作就是一场自我的搏斗”^{[5]244}。小说中,房思琪替林奕含毫不留情地解剖自我,“把邪恶面整个掏吐出来、沿着缝隙里外翻面”^{[1]52},“拉开拉链”露出“金玉里的败絮”^{[1]52},勇敢的展现真实自我和独特命运。小说之外,林奕含的写作不仅是展示,展现女性敢于直面创伤的勇气,更是思想的展开。她试图以试错的机会消除偏见,通过具体经验促使女性自我生长,完成每个女性生命的延长,以此体认自身,寻找与世界相处的方式,将感性的生命体验转化为前行的力量。正如埃米娅·斯里尼瓦桑所说:“我以我的诚实震惊了你,但更重要的是,我挑战了你,逼迫你思考。你明知不该相信我,却还是相信了我”^{[7]37}。

灵魂屡屡受挫,终于意识抬头。没有一种成长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没有一种觉醒是不带着伤痛的。房思琪作为小说女性群像中为数不多地具有主体意识的、勇于抗争的鲜活个体,也是以沉重的生命体验才换来女性主体意识的真正觉醒。她以杀出重围的幸存者的形象,竭力对镜像化的异化自我进行否定和超越,试图通过拒绝、指控、倾诉重新拿回女性的优势地位,构建完整的人格体系,摆脱女性被禁锢的命运。

女性主体意识与男权制度的对抗与融合,恰似雏鸟和蛋壳之间的互生关系:蛋壳是雏鸟在孵化前和孵化期的保护层,但如

果蛋壳永远不破,终将杀死原本该保护的雏鸟。

3 强大父权对女性主体的漠视

性暴力的本质是权力的较量,这不仅体现在身体上,语言与符号象征也是权力体系的一部分。巨大的权力落差下,谁掌握权力,意味着掌握了社会话语权,享受对他人命运的操纵感。

李国华首先是父权的代言。女性崇拜的男性,“自有其经济与社会的背景为根源,并不是出于她的幻觉”^{[2]570},从小在规训中成长的女性,很难不仰视身边处于优势地位的年长男性,期待获得身份认同。李国华周围的女性对他尊崇远多于防范:房思琪、郭晓奇“从来没把老师当成男性,从不知道老师把她当成女性”,成年女性许伊纹会忽略掉李国华自我卖弄时“话语本能的在美女面前膨胀”^{[1]35},以及他眼睛里“研究的意味”和“贪馋”^{[1]53},房思琪的母亲允许李国华傍晚时分从家里带走女儿,甚至都不强调别太晚回家……她们看似是被李国华的名师光环和“过了需要守备界线”的年龄^{[1]38}所遮蔽,实质上却是集体地、自发地对“父性身份”的重新确认。年长的教师身份对李国华而言是化了妆的欲望,藏剑于身后的掩护,对女性而言却是父性特征的隐喻,“温存的权威”^{[2]570}。

对于房思琪、郭晓奇而言,语文老师李国华还代表着语言权威,掌控着语言的最终解释权。滥用和重组的语言术语贯穿李国华侵害的整个过程,他说房思琪“是他混沌的中年一个莹白的希望”^{[1]43},自己和“寂寞和平共处了这么久”^{[1]115},是房思琪“低头写字的样子打破了他”^{[1]115};说郭晓奇像“是从刀子般的月亮和针头般的星星那里掉下来的”^{[1]97},“比爱女儿还爱你……都是你的错,你太美了”^{[1]98},自己下辈子要“赶不及地娶走”^{[1]98}。话语即权力,文学语言充当了李国华传达权力、掩盖丑陋事实、将性侵合理化的工具,通过散文诗一样精巧的语言表达,李国华将污秽包装成真爱,让受害者“粉碎在话语里”^{[1]43},“在话语里感到长大,再让她的灵魂欺骗她的身体”^{[1]43}。

在房思琪、郭晓奇的认知里,语言表达的是真实内心,言语和行动,形式与内在理应一致,所以她们即使“觉得自己跳进去的这个语境柔软得很怪异”^{[1]146},也会被李国华的话术隔绝感官,改造思想,以自我麻痹、遮蔽、框定、驯化的方式主动参与迫害自己,帮助李国华实现男性畸形的性占有思想,从身体到精神都处于屈从地位,逐步沦为他的取悦者而非主体地位的捍卫者。

李国华还占据道德高地,更有权力为自己开脱,也更容易将自己的言行和思想体系合理化。房思琪说李国华是“肉食者”,并说“‘肉食者’在古文里是上位者”^{[1]108}的意思。从最初的专拣贫困家庭的女孩儿下手,到后来的“没有一定要上过他的课,没有一定是谁家的女儿”^{[1]45},李国华扭曲地“发现奸污一个崇拜他的小女生是让她离不开他最快的途径,而且她愈黏甩了她愈痛”,甚至当有女生因他自杀时心里是“歌舞升平的感觉”^{[1]45},“《清平调》的海啸”^{[1]45},对他而言,女性“最高的恭维就是为他自杀”^{[1]45}。所以,在李国华的视角下,郭晓奇只能通过纵欲对自我进行精神阉割,房思琪则只能被囚禁于笔杆之下,以文字进行宣泄。他“带着邪恶的自信”^{[1]132},“对自己所做的事在思琪

身上发酵的屈辱感有信心”^{[1]67},一旦有机可乘,便露出獠牙扑杀猎物,将恶释放到最大值,用“最下等的迷恋”^{[1]105}沉浸在“不知羞耻的快乐的渊薮”^{[1]66},就连《红楼梦》、《楚辞》、《史记》、《庄子》等文学巨作在他眼里也不过是性爱时的“娇喘微微”。李国华占据道德,却毫无道德。

行为是观念具象化的投射,利用职业优势性侵女学生的男老师群体,也是通过性占有兑现父权。他们结伴前往红灯区,攀比炫耀被性侵的女生数量,甚至以谁的更加低龄化为荣。这种具有攻击性和攫取性的性占有,“是肯定自己为主体,肯定自己为向上提升的存在超越性的”^{[2]560}。权力偏袒之下,欺压的产生便是必然。悖德男教师把自己塑造成性欲的容器,单方面将学生的“我是想变得像他”认知赋权为“我想拥有她”,新学年里一届届的女学生,在他们眼里是源源不断的,可供掠夺的免费资源。

林奕含笔下的男性形象,其实是文化惯性和意识形态的镜像,房思琪对女性主体地位的建构,意味着剥夺男性独享的自由自主权和对女性命运的掌控,更意味着要经历以男性视角为中心的社会话语场的过滤,因而必然遭遇困境。

4 社会性共谋下的合力解构

性暴力的完成,离不开整个社会对施暴者的共同协助,而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社会甚至不仅仅是协助者,更是施暴者本身^{[1]242}。如果说李国华的侵犯是杀身体,那社会性共谋就是杀灵魂,直接加速了房思琪、郭晓奇的精神坠毁,是她们与自我、与他人持续断裂的主要因素。

原生家庭性教育的缺失,反衬的是社会“性”禁忌对女性的性遮蔽。房思琪父母理所当然的认为,“什么性教育?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所谓教育不就是这样吗”^{[1]63}?讽刺的是,“性”的禁区和盲区却由李国华的性暴力打破,难怪房思琪说“父母将永远缺席,他们旷课了,却自认为是还没有开学”^{[1]63}。谈性色变的家庭与施暴者的性侵看似毫不相干,实则一体两面,“性”不能由家庭转达,性侵却能轻易破坏家庭的情感基石。

“性”文化中的性别歧视也很明显,女性因“性别逻辑而被锚定为‘受害者’……这种受害者意味着‘活该’”^[9]。“怀疑女性”是女性被性侵后普遍得到的社会回应,它暗含着“相信男性”的观点,这种对女性不信任的刻板印象在公众想象中占据着格外重大的位置。郭晓奇父母得知女儿被性侵后单方面指责她“乱伦”^{[1]173},“你以为做这种事你以后还嫁的出去”^{[1]173},“你跑去伤害别人的家庭,我们没有你这种女儿”^{[1]173},在和李国华当面对质的最后,他们更在乎的是李国华抢付了高价饮料,而非女儿的痛苦和抗争。

女性身体被侵犯,名誉被损毁,丧失掉“对生命的上进心,对活着的热情”^{[1]70},“整个励志的、清真的、思无邪的世界化为灰烬”^{[1]179},还不得不面临众人心照不宣的怀疑,以及由此被歪曲的事实,遭受整个社会的集体无意识,性侵是她们“不能叫外人看到,合掌围起来,又鼓颊吹气捋长它”的屈辱^{[1]108}。仅仅因为性别差异就选择性的怀疑女性,对男性表达认识上的团结,那么像李国华这样悖德的施暴者很难存在于道德秩序之中,所

以“他发现社会对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强暴一个女生,全世界都觉得是她的错”^{[1]81},而他所得到的惩罚看起来“几乎是一种褒奖”^{[1]179}。

被性侵后,女性的“囚徒困境”还离不开网络隐形权力的推波助澜。网络看客的集体围观自带压迫,充满暴力的语言攻击更是具有杀伤力。郭晓奇勇敢地在论坛披露被性侵的事实后,帖子的阅览者化身二次加害者,他们将自我束缚在庸俗语境中,将词语被滥用和曲解后构成的网络语言蜕变为攻击锐器,随心所欲地实施语言暴力,却缺少对他人苦难最基本的同情。《黑箱》的作者兼主人公伊藤诗织提到自己被性侵后,互联网会构造出一个与她拥有相同面孔,但她本人完全不认识的“诗织小姐”,许多与她没有半毛钱关系、甚至令人毛骨悚然的形象都与她本人捆绑在一起^{[6]166}。与此相似,郭晓奇被网络看客标签化、污名化为“鲍鲍换包包”、“第三者”^{[1]193},毫无事实根据地进行“荡妇羞辱”。

借助网络的围观性指责和集体发难,其实质是“二极管”式的社会评价标准。善恶、对错、美丑只能二选其一,极端化的选项之下没有中间地带,纯洁与不洁也是如此,哪怕是被强暴,身体的失贞也会被默认为自甘堕落,“娼妓化”的评价标准被肆意泛化。但是,从来都没有完美的受害者,也从来都没有完美的觉醒方式。“世界上愈是黑白分明的事情愈是要出错”^{[1]19},绝对化标尺下,评判标准异化便是必然,单一的话语视角必然造就理解的粗暴,“就意识形态效力而言,重要的不是现实,而是这种误传”^{[7]17}。

林奕含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8],社会言语对受害者精神的强暴,使得受害者再怎么勇敢也是孤勇者,“她找不到自己,她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孤独,是根本没有人的孤独”^{[1]149}。在性侵这件事情上,整个文化语境出奇一致的抱团,站在施暴者一方:“以爱为名”的话语强权,“谈性色变”的家庭环境,“受害者有罪论”的社会规训……所有人合谋将受害者囚禁于“羞耻感”筑起的环形监狱,隔绝于精神孤岛。受害者们对自己充满同情与厌恶,怜悯和责备,试图通过拿回话语权 and 主导权建构女性主体地位,从而实现自救,却发现一切挣扎和反抗只是徒劳。房思琪能拆解李国华的语言系统,却无法与整个社会语境相抗衡,她找不到精神依托和指引,更没有对惯性模式予以反击的后盾和援手。反而因看的太清而更加绝望,不断加剧对自我的厌弃和否决:“来不及了,我已经脏了。脏有脏的快乐,要去想干净就太苦了”^{[1]64},“像小动物在叢猎中被树枝拉住,逃杀中终于可以松懈,有个借口不再求生”^{[1]62}。

小说中数次出现“圆桌”这一双关性的意象。林奕含通过言在此而意在彼的书写,表现了为圆满而圆满的文化特性:“圆桌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发明……省去了你推搡我推搡你上主位的时间”^{[1]223},“最坚贞的圆实际上也是最排外的圆”^{[1]14},除受害者以外的所有人构成“一个无差别的统一体和无分化的整体”^{[1]181},他们在无视他人痛苦的冷漠和对既有秩序的媚俗中,共同维持了“大团圆的抒情传统”^{[1]183}。在这场“向魔鬼的献祭”^{[1]3}

中,所有人在圆桌上和谐地如话家常,共同见证了房思琪们摇摇欲坠的内心世界最后的崩塌。

5 结语

无论是房思琪还是她的分身郭晓奇,她们都尝试过生命种种的可能,却发现没有一种是可行的出路,多重权力叠加下的反抗终显势单力薄,自我主体性的建构还未成型便已解体。

但小说之外,林奕涵的文字是在黑暗的房间中扭亮了电灯,我们因此看到了先前隐藏在阴影里的东西。黑暗和光明本是同源,罪恶被揭露,人性才有望被拯救。林奕含以她的毁灭帮助了更多的人走出黑暗,完成了自我救赎,就像她在书中让自己分裂出许伊纹走出了家暴的泥潭,分裂出怡婷替自己好好活下去。而与思琪在平行人生掉队的怡婷,终于还是与过去的自己完成了精神断裂,开启了新的生命周期。

感谢林奕含的文字,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发出怡婷同样地感慨:“能看到你的书的人是多么幸运,他们不用接触,就可以看到世界的背面”^{[1]222},“是她把我从幻觉幻听的哈哈镜前拉开,陪我看净几明窗前的风景。我很感谢她。虽然那风景是地狱”^{[1]230}。而这一切,正如作者林奕含在后记中所说,“只有相似处境的女孩才能解读出其中的密码”^{[1]254}。

[参考文献]

[1]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恋乐园[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

[2]西蒙·德·波娃.第二性[M].邱瑞銮,译.台湾:猫头鹰出版,2013.

[3]上野千鹤子.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M].王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2.

[4]沙法丽·萨巴瑞.女性的觉醒[M].李小霞,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

[5]新京报书评周刊.开场:女性学者访谈[M].北京:新星出版社,2022.

[6]伊藤诗织.黑箱:日本之耻[M].匡匡,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

[7]埃米娅·斯里尼瓦桑.性权力:21世纪的女性主义[M].杨晓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4.

[8]《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作者访谈[OL].<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10362458>.2017-05-06.

[9]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M].杨莉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50.

作者简介:

姚凤珠(1987—),女,汉族,甘肃省天水市人,在读硕士研究生,天水师范学院文传学院,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陈变红(2000—),女,汉族,甘肃省平凉市人,在读硕士研究生,天水师范学院文传学院,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